

# 中国模式

# China Model

A New Developmental Model From the  
Six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 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 AFFAIRS

潘 维 主编

潘 维 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高 梁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的变迁

章百家 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

温铁军 “中国经验”的“中国特色”

贺雪峰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

李 玲 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

胡鞍钢 中国减贫之路：从贫困大国到小康社会（1949—2020）

赵穗生 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王绍光 如何摸着石头过河？

朱景文 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

强世功 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樊 鹏 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对国家维护稳定模式的影响

李 强 人民共和国60年的社会分层结构

张 静 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

张 翼 中国60年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迁

朱云汉 中国模式与全球秩序重组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 AFFAIRS

# 中国 模式

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

China Model

A New Developmental Model From the  
Six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潘 维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潘维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117-0077-3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2658号

---

## 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630千字

印 张 40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0.00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 旧邦新命（代序）

吴志攀

---

“人民共和国 60 年与中国模式”，这确实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命题。回顾过去的 60 年，中国人走出了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取得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成功——我们认为，走这样一条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符合历史的规律，也代表着时代的潮流。

1954 年 9 月 15 日，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辞，当时他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他又说：“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他还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毛主席是多么的自信！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自信从何而来？就是我们坚信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自信，我们百折不挠、前赴后继。

不久之前，我们隆重纪念了改革开放 30 周年。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总结 30 年的历史经验，其实也就是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意义并不亚于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有这 30 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有 30 年政治局面的稳定，我们对中国模式就更加有了自信。我们现在终于敢宣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即使我们现在还无法完整地、准确地

在理论上说明它，但它一定是存在着的，而且还是相当成功的。

今天，我们不仅仅要回顾改革开放的 30 年，也不仅仅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追溯，比如 100 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如何？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

1909 年，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位。我读过溥仪的回忆录，就是那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对其中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溥仪 14 岁时，英国人庄士敦进宫成为他的师傅，溥仪对这位洋师傅十分崇拜。他这样写道：“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

溥仪在名义上曾经是统领中国亿万生灵的君王，可他很容易就被西方文明征服了。这对 5000 年延绵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能找到很多。为什么我们在 100 多年前失去了自信？而且竟然自轻自贱到了那样一个程度（这种自卑心态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

另一方面，我又要问：为什么我们仅仅用了 60 年的时间，就基本找回了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从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到扬眉吐气、“中美共治”（当然我们对类似“G2”、“Chinamerica”一类的说法务必保持冷静，但中国实力的大幅度提升是不争的事实），时间如此短暂，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为什么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学者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个人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华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中国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学习，我们的祖先善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中国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简单、封闭的体系，而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厚，而且也非常开放的体系，是一个集合了各种文明要素的复合体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学习能力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基因。

近代以前的中国曾一度闭关锁国，昧于天下大势，尽管我们未必就是“落后的”，但却因为学习能力的丧失而变得虚弱、麻木、被动，结果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在灾难面前

是不会低头的。今天再来读毛泽东的书，读邓小平的书，再往前，我们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心态的开放、胸怀的宽广、目光的远大、意志的坚定，这是令我们今天都非常惊憾的。他们身上正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学习能力。我们曾经惨败于西方，但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很快就从战败的屈辱中重新站了起来，他们痛切地进行反省，迅速地汲取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营养，用很短的时间形成了自己民族的领导核心，凝聚了新的价值共识，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靠的是军事实力，比的是谁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更多。而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赶了上来。我们看整个20世纪，中国的进步其实是最快的，我们的相对国力变化是最大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恢复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力。基于过去100年、60年和30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应该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在学习、借鉴、批判、扬弃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在以中国的本土经验、中国传统为本位的基础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呈给各位读者的这本潘维教授主编的论文集，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深入思考，他们的解释当然比我的上述感想深刻、缜密得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非潘维最早提出来的，但他在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却是最令人佩服的。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他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历史研究，总结了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清晰的、甚至是充满了魅力的概括。此外，王绍光、强世功等人的论文，同样富有挑战性，极大地启发了我们。

我还认为，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中国模式”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都已经是客观的存在。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已经有30年的学术积累，他们受到过很好的训练，有很强的使命感，能够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表达对中国与世

界问题的真知灼见，他们的立场、视角都是独特的。无论在相关问题上持何种立场的学者，都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这些论述。而且，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对于在西方模式基础上形成的现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经构成了挑战，这不仅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使整个人类的知识有了新的丰富。有了这样的贡献，中国的学者可以问心无愧——当然，我们还期待着这样的贡献能够更大一些，期待着潘维等学者未来的研究，在逻辑上能够更加圆融，在方法论上能够更加自觉，在立场上能够更加坚定、独立。同时，“中国模式”显然仍在发展变化之中，这也要求学者们能够与时俱进。

我期待，随着本书的出版，潘维等人提出的命题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他们的许多具体观点，也应该引起高质量的批评。学术界百家争鸣，“中国模式”派当然算一家，但也仅仅只是一家。大家都来研究真问题、讨论真学问，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

最后，我想引用1946年冯友兰先生为西南联大所做的纪念碑上的一句话来作结。冯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者也！”

## 目 录 CONTENTS

|     |          |   |
|-----|----------|---|
| 吴志攀 | 旧邦新命（代序） | 1 |
|-----|----------|---|

### 总 论

---

|     |                             |   |
|-----|-----------------------------|---|
| 潘 维 | 当代中华体制<br>——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 3 |
|-----|-----------------------------|---|

### 经济篇

---

|     |                                                  |     |
|-----|--------------------------------------------------|-----|
| 高 梁 |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的变迁                                 | 89  |
| 章百家 | 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                                  | 133 |
| 温铁军 | 董筱丹<br>“中国经验”的“中国特色”<br>——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可复制性 | 163 |
| 贺雪峰 |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                              | 181 |
| 李 玲 | 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                                   | 201 |
| 胡鞍钢 | 中国减贫之路：从贫困大国到小康社会（1949—2020）                     | 237 |

## 政治篇

|     |                                                |     |
|-----|------------------------------------------------|-----|
| 赵穗生 | 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 281 |
| 王绍光 | 如何摸着石头过河？<br>——从农村医疗融资体制的变迁看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br>与适应能力 | 314 |
| 朱景文 | 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br>——以纠纷解决正规化和非正规化为视角                | 380 |
| 强世功 | 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br>——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                    | 412 |
| 樊 鹏 | 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对国家维护稳定模式的影响                        | 455 |

## 社会篇

|     |                     |     |
|-----|---------------------|-----|
| 李 强 | 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社会分层结构   | 499 |
| 张 静 | 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      | 560 |
| 张 翼 | 中国 60 年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迁 | 579 |

## 国际篇

|     |             |     |
|-----|-------------|-----|
| 朱云汉 | 中国模式与全球秩序重组 | 603 |
|-----|-------------|-----|

总

论



# 当代中华体制

——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潘 维\*

---

## 引 言

在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庆典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在海外是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深感震惊，以至于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在国内却是党政干部执政理念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和舆论碎片化，官场纲维有待整饬，社会矛盾有待调整，甚至还有个别人对我国前程产生悲观情绪。

从海外看中国，60 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当然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绝非“粉饰”而来。

西方“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 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20% 以上。较之西方 300 年的进步，新中国 60 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人民共和国 60 年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成就？为什么人们感觉危机四伏？

有学人认为，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成就乃属子虚乌有，而解决危机之道在于“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在于我国以 60 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条道路。

---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一)

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政策法规是统一的，但代表人民局部和眼下利益的“民意”却各不相同，政府恒定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民心”向背才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

“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

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社会利益的过程。所有的政府都需要经受平衡三类六种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

就“民意”和“民心”的区分而言，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造就了人民生理和心理最健康的国家。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尽管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社会也非常稳定。

较之西学简单生硬的“合法性”概念，民心与民意之分要高级得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治理国家的手段归纳为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这四种手段还是区分“政客”与“政治家”的试金石。

(1) 强力维护社会秩序 (law 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应用，不可或缺的手段，却也是最浅显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 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 (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应用的手段,但也相当不可靠。正所谓“民意如流水”。

(3) 平衡“三类六种”利益,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精致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 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 (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得民心、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认知的,是主观建构的。

“中国模式”则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方式。

## (二)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原因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 60 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 60 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就是 21 世纪的新版中华体制。

有学人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但新中国的 60 年是大变迁的 60 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 60 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

也有学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面临溃败;既然中国将失败,总结中国模式就没有意义。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发展亦如此。

还有学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这里要说明，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以及延续不断以迄今日的侵略战争。

更有学人认为，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是失败，后30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

### (三)

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除这篇“引言”外，正文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每章又分三节：（1）讨论子模式建构的意义和理论依据；（2）归纳子

模式；(3) 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文章“结论”阐述子模式间的有机联系，概括中国模式。

经济、政治、社会的独特模式当然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中华拥有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还拥有深厚的外交传统，颇具特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笔者力有不逮，只能专注于自认的三大“核心”问题了。

## 一、国民经济

### (一) 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 1. 为什么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争议攸关中国未来 30 年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攸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直到 2008 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众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更深刻的分歧体现为下述疑问：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 30 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成就？2008 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 30 周年，直到年底，主流的解释依旧是前者。然而，2009 年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持后一种看法的人骤然增加。尽管人民共和国前、后 30 年的经济统计口径大不相同，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也不同，但证明前 30 年的经济和技术高速进步依然轻而易举。用后 30 年的富裕比较前 30 年的贫穷会遇到逻辑困境，如此，前 30 年只能用来比较新中国成立之前的 30 年。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

“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60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30年。在这30年里，去掉1949—1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30年9.8%飞跃式年均增长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是偏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19世纪的英、日、德、法，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而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祭奠鸦片战争170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30年的末期，我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正题”与“反题”都在步入历史，“合题”正在浮出水面。这“合题”要从60年的成就中找，也要从我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找。

中国不反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之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

中国人自古就熟知“市场机制”，懂得少贵多贱的道理，却从不迷信看不见的手，而是以看得见的手“损有余，补不足”，为百姓福祉“常平仓”。<sup>①</sup>在中国，“经济”不是围绕资本利润而做的学问。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终极理想是“天下为公”，私有制消亡。所谓竭力把盘子做大，让大众永远承接少数人杯盘中溢出的汤汤水水，是极端偏向少数人的学问。

不仅如此，与当今关于“现代化”的大众知识不同，我们明智的祖先们不把“经济发展”当做成功的主要标志。“天下太平”才是成功。中国传统

<sup>①</sup> 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载《新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期（1921年7月）、18卷15期（1921年8月）；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张文：《宋代社会救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